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八〇期 ——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12c)

【史海钩沉】	大造反派党言川——纪念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	郑 义
【亡灵祭坛】	我们的“七仙女”——记黄梅戏女演员严凤英之死	苏晓康
【往事追忆】	北航文革中的两件事	戴维堤
【难忘岁月】	夺权未得到中央承认	梁守福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大造反派党言川——纪念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

• 郑 义 •

河南出了个党言川。不是出了个毛泽东，是党言川，文革时代名震中原的大造反派。他的造反，在40年后的若干精英人士看来，不仅极其愚昧，而且毫无价值。但是，在当时人们的感受中，那是17年漫漫长夜中升腾而起的一颗启明星！党言川和他的同代人，虽然没有高级的民主理论，但他们心胸中煎滚着的对黑暗的憎恶和对自由的渴望，似乎比今人强烈得多。

现在是2006年7月中旬。如果令时光倒转40年，再有一个多月，党言川的星辰就会迅速升起，撕裂黑暗，给被压迫被凌辱者带来勇气。

1966年夏，正当北京深陷入权贵“红卫兵”所制造的红色恐怖之际，河南省却冒出一个震动全省的平民造反派组织——“郑大联委”。它的灵魂人物，正是那个即将成为标志性人物的郑州大学中文系学生党言川。党言川以其对农民的深刻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无比愤恨，影响了“郑大联委”的政治立场。据历史记载，“郑大联委”是8月21日成立的。第13天，即9月3日，这个初生的羽毛未丰的造反派组织就发出一份《火急呼吁书》，其势若野火，迅即燃遍中原大地。

呼吁书写道：“多少年来，河南省搞得很不像样子，五千万河南人民被穷白两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在1958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彻底追查清楚，坚决地把根子挖出来！”——整整40年过去，今人已很难体味那种石破天惊的震撼。虽然呼吁书使用的仍然是毛式概念和语言，但众多战战兢兢苟活于专政岁月的人们，很快就看出了那逼人的剑气——这是冲着共产党、毛泽东去了！在共产党治下，河南人民头上压着“两座大山”！1958年（高举三面红旗高歌猛进的火红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件”——反了！反了！真真反了！

心有灵犀一点通。河南人稍加思索，就明晰那“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正是“信阳事件”等惨绝人寰的大规模饿死人惨剧。那一时代，中共无法指称那些遍及全国的大饥馑，只好以中性词汇“事件”来搪塞，如“信阳事件”、“环江事件”、“遵义事件”等等。至今我们仍然难以理解党言川及其战友们的盖世勇猛：他们刚刚锻造出长剑，第一次拔剑出鞘就直逼对手之命门！下罢战表，翌日（9月4日）便成立“专揪吴芝圃战斗队”，派人专程去广州抓捕前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大饥荒制造者吴芝圃。再一日，9月5日，“郑大联委”这个年轻的造反派组织联络召集了“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风点火大会”。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历史如此记录：“来自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等地一百多个单位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及外地来郑串联的师生五万多人参加了大会。”造反的长剑一旦出鞘，就再也没有插回去：在这个会上，党言川和他的战友们毫不含糊地开始追究饿死三分之一人民的“信阳事件”。

6天之后，9月11日，“郑大联委”第二次主持全省各界炮打省委大会。吴芝圃没有抓回来，就把现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赵文甫推上台，挂上“历史反革命”的牌子。有当时在场者纪登奎等官员不满，当场质问大会主席：你们说赵文甫是历史反革命，有什么根据？——在这，在造反派和中共官员之间发生了一点有趣的名实错位：在中共官话辞典，“历史反革命”特指内战时期的政治反对派。省委副书记赵某至多是犯错误的共产党干部，称“黑帮”可也，如何成了死敌国民党？但纪登奎先生没有站在造反派方面想一想：大饥荒已然过去6、7年，称之为历史也不为过。关键在“反革命”三字：参与大量饿死黎民百姓，不是反革命还是革命？逻辑大约是这样的：既然“反革命”是“最坏的”，你们这伙视百姓为刍狗的共干难道不是“反革命”！

40年后，当我们试图复原历史图景时深感疑惑：在当年共产党之铁打江山，小小党言川如何能一呼百应，在短短数日内组织起两次声势浩大的全省性集会，声讨前任省委书记，批斗现任省委副书记？首要的条件，当然是毛泽东对造反的首肯。在此之前，或非议一位基层共干，或张贴一张巴掌大的小字报，皆为逆反，入十恶不赦之罪。1966年，毛为了整肃政敌，不得不与人民临时结盟，于是造反不仅被允许，并且成了“继续革命”之“首创精神”了。说文革肇始于毛泽东的煽动，这句话十分正确，过分正确，不仅写入官方决议、宣传纲要，并成为全社会之共识。据说，在“现代迷信”的蛊惑下，中国人整个是疯的，“造反”二字之前，就必须加上一个限制词，叫“奉旨”造反。什么造反派，不就是毛泽东的一群走狗吗！但请看一看河南，看一看党言川！毛似乎并没有邀请他们来反对他的“三面红旗”，但党言川们义旗一举，便兵锋直指老毛的痛处。

1966年夏，河南人在省城一次又一次盛大集会，看上去红旗如海，然而其背后所涌动的，并非领袖崇拜的疯癫，而是大饥馑幸存者岩浆般的仇愤。今天，那些被活活饿死的罹难者对我们而言不过是一些没有体温的数字。40年前不是这样。对40年前的河南人来说，他们尸骸未腐，坟土犹新，尚为新鬼，那数以百万计的幽灵还在人间徘徊。

在1966年盛夏那种谲诡的风向不定的时刻，党言川抓住“造反有理”的圣旨，趁机造反了！

不管是谁，只要代表了被压迫被欺凌者的情感和意志，就会成为历史的中心。振臂一呼间，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就成了为民请命的英雄。

在党言川和他的战友公开扯旗造反之前，1966年8月，河南出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文本。（有论者坚称：文革不过是比赛革命的革命。哪有什么造反、人民文革？口说无凭，请拿出文本来，让文本说话！）

其一，郑州大学贴出一份轰动性大字报，题目是“千刀万剐吴芝圃”。郑州是转抄，原作是光山县一位青年学生。题目十分暴力血腥，今天的先生淑女们大约会皱起眉头，说吴芝圃也有他的人权，“千刀万剐”总是不合适的。这当然很政治正确，但吴芝圃当年却是把他治下的黎民百姓“千刀万剐”了。再说了，吴芝圃那样的高官，也是草民百姓们够得着的吗？从下文将会看到，下了台的吴芝圃都有军队保护。——让我们回到文本——大字报说，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

（引文）自1959年重阳节吃最后一口米饭（指基本断粮——郑注）至60年春，光山县4、50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在最严重的时候，走一段路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子散、全家自杀、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人民遭到了大劫杀、财产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其惨状不堪耳闻目睹，痛苦不堪回忆，笔墨无法描述！要知道58、59两年光山县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啊！可是59年连种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筛下几粒粮食也得上交，哪谈得上口粮！……（引文完）

我希望能够找到这份大字报的全文。它应该进入将来建立的文革博物馆。

我为什么说吴芝圃先生当年把黎民百姓“千刀万剐”了呢？我为何如此怒不可遏地使用暴力语言呢？因为吴芝圃先生和他的同僚们曾尽情挥洒暴力，把共产暴力传统发挥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其冷血，其创造力，皆可谓登峰造极。今人已不明白何以能大规模饿死人了。没吃的了还会逃荒吗？往哪逃呢？古代饿死人，是灾区面积过大，等断粮后再逃荒就走不出去了。本朝却是在每一路口、车站、码头遍布军警民兵，不准逃荒，不准给“三面红旗”和地方官抹黑。光山县大字报上出现了“打死”二字，未加解释。当时的人们都知道，那是因为逼粮。今人知道不知道，那就难说了。不知不为耻，时代不一样了。就怕遇上那号智商低下者，上来就骂饿死活该，谁让你们“亩产万斤”呢！——饿死的不是“放卫星”的，谁是谁还没搞清呢！“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老毛爱大跃进，各级党官就大放“高产卫星”。牛皮吹大了，粮食却交不出去，就从农民嘴抠。村队干部也怕饿死，就和百姓勾结，“瞒产私分”。“父母官”们的办法就是一个字：“打”，毒打，往死打！最后把饲料粮、口粮、甚至种子粮尽行掠去，再派出军警民兵防堵逃荒。（甘肃曾发布过这样一条“死命令”：“不准外逃，坚守岗位，凡靠近铁路一百米内的作偷越边境论，一律格杀勿论！”）那一年，河南全省粮食产量只有281亿斤，吴芝圃们竟高估（并高报）为702亿斤。这颗“卫星”一升天，河南人就只有下地狱了！两个数字往那儿一摆，成批饿死人的惨剧已势难挽回。作家白桦是河南人氏，后来回老家息县一带作了些初步调查：息县639个村庄死绝。邻近的固始县，400个村庄死绝。

文本之二，是被当作罪证公诸于世的党言川的一封私人信件。1962年，党言川给新乡师院的同学写了这封信，4年后，新乡师院文革工作组组长丁某竟然奇迹般地得到了这封信的原本。我们不能不向“组织”的阶级嗅觉脱帽致敬！以今天的某些“思想彻底”的朋友们的眼光来看，这封信深受党文化浸染，实在与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无关。但历史记住了这个文本。

（引文）……你在第一封信中谈到你的学习心得和你对农村58—59年情况的看法，我完全

同意你的意见。追根求源是我们党中央在那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其次在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以及敌人的蓄意破坏有关。三面红旗，现在我们的党中央还想竭力地举起来，但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参加58—59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的情况。从理论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中国是完全应该有的，谁不想中国早日富强，谁不想中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如果像前几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最好还是不实行的好，我认为三面红旗已大体失去人心，要举起来，是有困难的了，不过总路线这一面旗帜，还可以更多的举起来，其它两面旗帜如果换换招牌，或者不经过相当的努力，反复的宣传，要举起来难极了。（引文完）

白纸黑字！

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转抄的《千刀万剐吴芝圃》大字报，以及1962年私人信件，成了党言川“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之“铁证”。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在前文所述的9月5日“炮打省委”大会上表态说“你们的大会风煽得好，火点得好，我坚持支持你们！”而扭转身来，在次日的省委常委会上则进行了相反的部署：对“郑大联委”要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原则。“表面上应付它，暗地慢慢压垮它。”“我看党言川不是个好东西！”

共产党省委的态度，就是“保皇派”的态度。文敏生先生对党言川和“郑大联委”定性之后第二天，也就是9月7日，郑大校文革领导小组和“郑大红卫兵”也发出了一个紧急文告：《全省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炮打河南省“司令部”的资产阶级当权派》。从这个题目看不出什么名堂，正如今人所嘲讽：什么造反派保皇派呀，不都是破四旧、打砸抢、开批斗会吗！但细读内文，味道就品出来了：“我省五千万勤劳、勇敢的革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尤其是从1958年以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省委‘司令部’中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他们把持了一些部门。”“把省委内部所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统统地斗倒斗垮！黎庭扫穴、斩草除根，使之断子绝孙、万劫不复！”

一头是造反派，要抵制“三面红旗”，一头是保皇派，要捍卫“三面红旗”。一头要揭发毛共置人民于死地的极恶大罪，一头要把造反派和同情造反派的官员“统统地斗倒斗垮”。至于“黎庭扫穴、斩草除根”等文字，已是隐含杀机了。

保皇派们发动了对党言川的革命大批判。从下列两则引文，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引文）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河南，一个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的河南，一个居住五千万革命群众的河南，竟被他们骂成这个样子！……他们还公然煽动要大闹河南省委，要闹个天翻地覆，闹得越乱越好，请同志们用毛泽东思想来鉴别一下，这到底是哪家的声音？（引文完）

（引文）我们认为这封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箭。党言川在这封信不但恶毒地攻击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否定了1958年以来我国人民在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有人说，这封信是党言川在1962年写的。言外之意似乎可以原谅。我们说，正因为是1962年写的，18岁的党言川就有着如此系统，如此反动的观点，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引文完）

保皇派们抓牢了党言川和他的造反派战友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毛主席”之“铁证”，发起猛烈攻击。据记载，声讨党言川的传单发至全省乃至外省，连相隔数千之遥的广西桂林也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党言川一伙的罪行”。他们的皮肤极端敏感，早已遍体生寒：党言

川剑气所及，何止一位河南吴芝圃？吴芝圃背后，不正是三面红旗的伟大旗手毛泽东吗？这一点，无论造反派们当年是否有所意识，在政治效果上是差别不大的。有谁不清楚毛是始作俑者呢？没有，除了吃奶的娃娃。

在当时那个思想整肃极其严酷的时代，为了自保，造反派们只好违心地作出部分退却。“郑大联委”赶紧发出《关于九月三日〈火急呼吁书〉的声明》（9月25日），承认《火急呼吁书》中某些言词偏激，提法不当，声言“我们虚心接受批评”。辩解“我们发出呼吁书的目的，是为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是为了炮轰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资派。因此，我们认为，起草的这个《火急呼吁书》大方向是正确的。”最后，党言川和他的战友们赌咒发誓：“不彻底改变河南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死不瞑目！”本来骨子是要乘机清算暴政，这一下子把自己装扮成改天换地的青年愚公！照理说这种障眼法极其幼稚，还比不上从大礼帽往出掏鸽子。但事情就是如此奇妙，党言川和“郑大联委”就是赢得了河南民众的强烈支持。是真不明白党言川们在“打着红旗反红旗”吗？心照不宣矣！嘴上说了两句软话，但斗争“大方向”是丝毫不动摇的。67年元月，“郑大联委”串联各大专院校，组织起“专揪吴芝圃联络站”，一面深入大饥荒发生地掌握原始材料，同时再次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持清算“极左路线”造成大饥谨的滔天罪行，始终把矛头指向“极左路线”在河南的代表人物，深得人心。正因此，造反派的队伍迅速壮大，从少数派变成了多数派，并奠定了河南文革的主轴。

毛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据我研究，确是为了夺回“旁落”之大权。（麦克法夸尔在他的著名著作《文革大革命的起源》中有相当有说服力的论述。）某些研究者认为毛也有革命理想的成分。也许不便彻底否定，但我敢说那成分是极其稀薄的，有如万米高空的大气。1966年，毛在和他的老搭档们摊牌之前，曾暗中调动军队，完全控制了北京及其外围的局势。这一点，我们不懂，但峰层的权势人物懂。延安“整风”时他们就领教过一次了。当毛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特别是进入“打倒”和“夺权”高潮之后，毛和全党官员的矛盾日益公开化、白热化。强烈的抵制从中南海怀仁堂开始，一群老将军拍了桌子，叶剑英拍断了指骨。虽然他们没有控制京畿地区军队，但有十足的把握掌握全国军队。记得是第二天，叶剑英就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下了一封信件，扭转了毛的文革路线，史称“二月逆流”。叶剑英们对军队的情绪估计得很准：几乎是一瞬之间，各地军队都开始严厉镇压。运动又回到文革之初刘邓工作组专政时期：不是批斗走资派，而是镇压反革命了。

河南风云突变。

省军区介入运动，打击造反派“郑大联委”、“二七公社”，扶持“十大总部”（典型的保皇派）和“河南造总”（从造反派中分裂）。河南当地叫“二月黑风”。“郑大联委”被军区宣布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党言川锒铛入狱。

军队动手“镇反”我是略有见识的。那是在成都，军头一句话，马上就是军队全副武装出动，全省抓人。军区用飞机撒传单，硬是把造反派大本营四川大学撒成一冰雪世界！河南也不遑多让，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告全省人民书》也是用飞机空投的。这就是河南民谚“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之由来。当然，官军想镇压的不只是一个党言川。大批造反派领袖、骨干甚至普通成员被捕入狱。没有进监狱的，也要“投案自首”、公开批斗。如同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整肃运动一样，河南造反派也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倒在地。造反派搜集整理的大饥荒材料被抄走，从广东揪回来的罪魁吴芝圃也被官军保护起来。那位刚刚被造反派批得“靠边站”的赵文甫省委副书记，按捺不住反攻倒算的狂喜，多次给军区政委何运洪写信，说军队的镇压“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保皇派威风”，“大破了资产阶级控制，真正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你们干得好！你们要干到底！”

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军队把“四大”变成了“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把文革变成了“镇反”。（有人对文革时期的“四大”甚为不屑，认为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对这种高论，我是竭诚拥护的。但是，无论在1966还是2006的中国，在这种令人窒息的高压社会，能说一句话，总比勒住喉咙要好。“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总比“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要好。）官军祭起了他们的“四大”，一下子把河南搞了个天地翻覆：造反派成了“反革命”，“保守派”成了“造反派”。这种“大翻个儿”确实把人翻糊涂了，40年后的今天，不是还没翻明白吗？邓共恨造反派，说造反派反共。“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恨造反派，不是恨他们反共，而是恨不反共。造反派就成了垃圾箱、污水桶，成了投射仇恨的箭垛。文革结束后，官方宣传机构进而以“造反派”来称呼所有群众组织。如此一来，保守派的那些诸如北京“红八月”式的大抄家、大屠杀、大遣返，那些诸如大兴屠杀、道县屠杀、宾阳屠杀、武宣吃人、广西屠杀等等臭不可闻的屎盆子，就悉数扣到造反派头上。

让我们回到1967年春天。河南省军区铁腕镇压造反派，“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还不能彻底压趴下，就组织武斗，制造了一系列攻打、围剿二七公社派（造反派）的流血事件，致使造反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后来，在清理“三种人”（实际上是一种人：造反派）的“揭批查”运动中，造反派遭到更加严酷的清算。凡是参加过造反派的，“人人检查、层层过关。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车间班组，机关到公务员、炊事员，街道办事处也要揪出‘帮毛羽’，有的地方竟提出‘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后来的一位省委书记李庆伟先生公然宣称：“文化大革命中对领导干部动一指头的，也算打砸抢。”（一丁：《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造反派造了一年的反，被清算的时间长达十多年。仅“揭批查”运动就是七年（1977—1983），整肃二七公社派的群众和干部5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10万6千人，逮捕判刑1700人，又“突击判刑”2400人，加上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不计其数。例如一个焦作市，判刑96人，捕了318人，劳教37人，随意关押一两年再释放的185人，死亡11人。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的“文革罪”犯约占半数以上，使参加过造反派的人人人自危。（原河南省常委 赵俊峰：《就河南揭批查的历史遗留问题向党中央反映的情况和意见》）

为什么会这样？

——保守派和受到过民众冲击的“走资派”上了台。

河南民谚曰：“一派升天，一派坐监。”

负责“揭批查”运动的河南省中共纪委书记赵文甫、副书记李蔚，原来就是保守派的领军人物，现在由他们来操刀了。

我需要花上一点篇幅来介绍这两位人物。

赵文甫何许人也？河南文革第二号“走资派”。今人一见“走资派”三字，就以为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一“派”、务实派、开明派。风马牛不相及也！那不过是一面枷，一顶帽子，想整谁就给谁戴上。赵文甫同志不是党内开明派，而是货真价实的毛派。有三桩事，河南人永辈子忘不了他。

第一桩，叫“反右翻番”：1958年春，全国反右运动已基本结束。赵文甫下去巡视，认为不够彻底，要“补课”。这一下不要紧，全省右派总数翻了一番。第二桩叫“打小潘复生”：潘复生是大跃进时期的省委第一书记，对农民还算不错。庐山会议之后，被第二书记吴芝圃和这位赵文甫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罪名打下去。河南农民的评价是：“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这个“苦”有多大呢？大约饿死400万—500万人。本来不至于饿死这么多人，架不住赵文甫追随吴芝圃在全省到处“反右倾”，“插红旗，拔白旗”，把

20万体恤下情的党员、干部打成“小潘复生”，为更大规模的逼粮饿死人扫清了道路。因此，赵文甫不仅仅是反右、大跃进、公社化运动的狂热推行者，而且是反右倾运动的主将。河南大饥荒有他一份罄竹难书的特大功劳。还有一桩叫“骨灰投机”，比较有趣，算得上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段子。1969年11月，刘少奇惨死于河南，骨灰被秘密保存在一军。军队换防时，一军领导将刘少奇骨灰盒移交省委，刘建勋交代省委副秘书长霍云桥放省委机要室保存。文革后期，此事被赵文甫得知，大喜过望：“好哇，刘建勋竟敢包庇党内最大走资派！凭这个铁证，非跟他算帐不可。”赵准备将刘建勋置于死地，以猎人的耐心等待最佳时机。不料局势丕变，不旋踵毛逝世，江青被捕，刘平反，王光美来河南迎取骨灰了。此时，刘建勋成了毛线上的人，下台了。赵文甫摇身一变，亲自将骨灰盒交给王光美，并陪同进京，参加追悼会，电视、报纸上捞足了政治资本。还说自己是“戴着走资派的帽子，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盒……”前河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赵俊峰给了他一个相当客观的评价：“赵文甫平时不干工作，专门在来运动时整人，这是河南广大干部都知道的。”——这样一个双手沾满河南人民鲜血的凶手、政客，党言川和河南百姓起来反了一下，反错了？反不得吗？

另外一个操刀的人物叫李蔚，河南省中共纪委副书记、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文革中是大保皇派，由省委内部的保皇派骨干一直高升为全省保皇派联合体“十大总部”第一号领袖。他在文革期间不过是一个处长级别的省委秘书，但在围剿造反派，策划组织指挥大型武斗方面，有着特殊的能量和贡献。今人一说起文革武斗，立刻就恨恨地戟指道：造反派！邓共太仇恨造反派了，真可谓情深似海！造反派不仅遭到残酷报复，在舆论一律的中国，还成了一切罪恶的渊薮。真实的河南文革史偏偏要挑战这一指控：主要的，大型的武斗，其策划组织者并非造反派，而是有着枪杆子当靠山的保守派。

当时解决各省文革冲突，中南海多令各方派代表赴京谈判。河南军头何运洪知道不占天时地利人和，压根儿就不打算赴京谈判。他要在他自己的三亩七分地把造反派先解决掉，造成既成事实。他一边假惺惺地召集各方协商赴京谈判名单，一边给他的顶头上司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打报告，称：“关于召集各方到北京谈判问题，我们拟采取限制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代表名额的办法，把谈判的时间拖下去。……目前郑州形势正在急剧地向好的方面发展，右派力量正在土崩瓦解。……所以谈判时间越向后拖，对郑大联委越不利。他们必将越拖越垮，以至完全解体。”接下来，3月6日，军方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揭开了“镇反”的序幕。既然是“非法组织”了，还有什么可谈呢？何运洪先生就亲自往北京打电话了：“……河南的两派只剩了一派，我们不再派代表去北京谈判了。”但造反派并没有被彻底压垮，军方就开始策划武斗，借保守派之力，把造反派消灭。有资料证明，一些重大武斗事件，“突发”之前，军区头头都是事先知道的。按照当时中枢的命令，军队必须制止武斗，不能袖手旁观。军方自有锦囊妙计——陈再道、钟汉华指示何运洪：武斗开始不要去部队，只去一些人或宣传车看看就行了，等打得差不多了再去部队。何运洪欣然执行，等保守派把造反派打杀得差不多了，军队才去做做样子。

河南武斗，基本上是保守派依仗军方支持挑起的。但是罪名全部加在了造反派头上，因为保守派掌了权。天道好还，文革结束后，河南发现了一份策划一系列大型武斗的原始会议记录，被戏称为“出土文物”。北京几家报社的记者把这份文件一直捅到了中纪委、中指委（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出土文物”真实再现了当年（1967年）策划武斗的详细过程。凭保皇做官的李蔚等人，皆榜上有名。可是，那些像李蔚这样镇压造反民众的武斗策划指挥者，像赵文甫这样恶贯满盈的毛派余孽，都掌握了镇压之权，在对造反派的大报复中，再次用无辜者的血去染红他们的顶戴花翎。

1969年6月1日，毛泽东在停于郑州的专列上接见了刘建勋、纪登奎，问：“你们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哪一派吗？支持的是对的嘛！党言川怎样？”

刘建勋回答说：“他是省革委委员（应为常委——原引者注），表现不太好，我们批评帮助他，他给中央写了一个检讨。”据说这个检讨是党言川参加省委常委时写的，内容是“端正”对“三面红旗”的看法。作为中共高级官员，刘完全明晰毛问“党言川怎样”的弦外之音。党言川和他的战友们猛烈攻击“三面红旗”，大揭人造大饥荒，其矛头，最终是指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在需要煽起民愤以对付政敌之际，毛和刘建勋们可以暂不干涉，网开一面。当毛的战略目标达成之后，他们找后帐来了。当时被“结合”进各级权力机构的造反派，经由架空、削权，最后交给在文革中被过程性打倒的共干赵文甫们和死保共产专政的保守派李蔚们去全权处置了。

河南多数干部是支持造反派的。那是在毛和怀仁堂老帅们斗法胜利之后，那是在峰层一边倒支持造反派之后所作的政治选择。毛逝世后，他们也遭到严厉整肃。不管他们如何喊冤，说他们是好人，赵文甫、李蔚之流才是坏人，几届省委过去，一概无人过问。因为，（有省委高官透露：）“是邓小平同志支持河南这样作的”。——这就对了。

前述刘少奇骨灰是由一军所秘密存放。一军的头头是谁？何运洪。何运洪不是把揭露大饥荒的党言川们往死整吗？为何又甘冒风险保存同样是揭露大饥荒的刘少奇的骨灰？何运洪精神错乱了吗？

邓小平同样是反对大跃进的“务实派”领袖人物，党言川和造反派揭露大饥荒，（据今人理解）应该是一家人才对。为何他反而支持掩盖大饥荒的保守派，必欲置党言川们于死地而后快呢？邓小平精神错乱了吗？

他们谁都没精神错乱，是我们这些书生气十足的人神经有点错乱了。从根本上，何运洪、邓小平们都是毛派，都是一党专制的缔造者和捍卫者。他们和毛的矛盾，是共产党的内务、家事。他们所抵制的，不是共产党对人民的专政，而仅仅是毛翻脸无情的权争。至于奴役和镇压人民，他们和毛并无本质差别。所以之前才会有刘少奇的暴力土改，邓小平的反右，刘邓的文革工作组；所以其后才会有邓小平的清算造反派和六四屠杀。他们看到骨髓头去了：文革造反派，无论举什么旗，唱什么歌，骨子所反对的都是他们的命根子——共产党专制。

自中共建政以来所有的大规模政治迫害和整肃，已悉数被否定。地、富、反、坏、右、资、黑等等等等，都已经获得昭雪平反。至今还压在五指山下的，独有文革造反派了。走资派平反前后历时3年；右派平反最快的5年，至迟不过20余年；地富历史反革命时间较为漫长，最长者也不过30来年；文革造反派，从遭到反攻倒算那一天起，已经整整37年了！他们委实把共产党打疼了！

邓小平们要给予民们留下千年之规：永远不准反抗！永远！

所以他说，必须彻底否定文革！

他所谓“彻底”二字，对准的就是人民的反抗。

我并不要反其道而行之，对文革造反作全面肯定。多年前我曾写道：“利用皇帝反贪官，即利用现成的道统与法统反抗暴政，具有极大的合法性而不易招致立即镇压，容易形成声势浩大的规模，但无法摆脱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禁锢。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的谎言已经成为‘奉旨造反’合法性之依据。奉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之名，就必然落入编织得十分严密的极权主义谎言之网。如果是不自觉地利用，就会束缚我们的思想，以谎言为真实，反而‘弄假成真’，加强了谎言的欺骗性；即便是自觉地利用，也会使我们‘作茧自缚’，在历史机遇真正到来之际难以超越这早已腐朽的政治框架，提出真正的民主诉求。”（郑义：《两个文化大革命刍议》）

但我敬佩大造反派党言川。

他和他的战友们不仅趁机造反，还越旨造反，甚至抗旨造反了。

在那个极度黑暗的岁月，他义无反顾地为数以百万计惨死于苛政下的百姓申冤复仇，剑峰直指暴君。仅此一举，便应永垂史册！

党言川的星辰曾一度高高升起，以自己璀璨的光芒照耀大地。然后便坠入暗夜，永远熄灭。人们只知道他后来蹲过大牢，出狱后去向不明，莫知所终。他还活着吗？活下来也该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在一份当年的小报上，我找到十余字肖像：中等个子，戴眼镜，蓬松的头发，是长发。就这些了。一副书生气。人云：“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可不是吗，党言川造反的历史也就是三年，也是造反不成。但文革造反派岩浆般的仇恨与狂飙式的反抗，使邓小平登基之后不得不执行造反运动之遗嘱，大赦天下，改革开放。惜乎“成王败寇”，应该还是没有多少话可说的了。他们出鞘的长剑被折断了。党言川们千错万错，比起那些动口不动手的君子，至少是义无反顾地试过一把了！

在中国人追求自由的英雄系谱上，党言川应有一席之地。新一代未经统治者洗脑的人们，将会承认他的英勇反抗。两千年前，司马迁就曾经给失败的造反派作传，并极度尊崇地将其列入帝王“世家”。被压迫被凌辱者的反抗总是合符人性的。只要人世上还存在不义，再过两千年也不会改变。不承认呢？不承认就不承认。那阵儿的人，活得没有今人精细。扯旗造反之际，有谁想过历史地位、成败得失吗？没有。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反就反了！

~~~~~

## 【亡灵祭坛】

我们的“七仙女”——记黄梅戏女演员严凤英之死

• 苏晓康 •

去年秋天王友琴来邮件，说她要编《文革受难者》第二集，问我能不能写写严凤英之死，收进这个集子，我回复道：

关于严凤英之死，我偶然跟刘晓波谈起，他也要我写出来，前几天还来催过。我至今不敢动笔，是因为没有想好怎么处理这个题目，只想好了文章的标题：《我们的七仙女》，可是——

“七仙女”竟被开膛剖腹，而且是当众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怎样疯癫、倒错的世道，才会导致这种惨剧？堪比中国古代凌迟剖腹，碎棺戮尸的阴惨之刑，昭然施行于二十世纪，现代中国人的常识、伦理底线哪里去了？

直接施暴者，是一个军代表，他的权力来源是什么，竟可以令他如此丧尽天良而不被制止？谁又应当负责并被追究？

“七仙女”今天是如何被平反、有被重新歌颂的？平反是如何绕过了这个惨烈的细节？而忘掉这个细节，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无法下笔，是我面对不了这几个问题，我一动笔就心里发慌。我不能陈述完事实就了事，与其这样，我宁愿不着一字。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这穿越了古与今、南与北、神话与现实、传统与当今、官场与市井的一曲黄梅调，无论后来被多少人反复咏吟了多少次，已然已成绝响，而严凤英这个“坠入凡间的精灵”，曾给中国民间带来的艺术享受，几乎空前绝后，是目下演艺界的“天王巨星”们无法企及的。一个艺术家，在承平时可以家喻户晓、名满天下，一旦世道沦丧，或可遭遇常情无法想像的恐怖之境。一个艺人（江青）升天，气焰万丈，则普天下的艺人均成另类，或入狱为囚，或揪斗致死，或忍辱自尽，活得出来的寥寥无几，然而身受戕害之剧烈，无人甚于严凤英。无疑，这不是一个“黄梅戏巨星”个人的荣辱沉浮之道，这是制度性的问题，但又不尽然，严凤英惨剧所映射的解读空间和涵义，早已溢出这些范畴。

#### ◇ 严凤英丈夫对妻遭残杀的叙述

八十年代我因采访书写的缘由，闻听过无数文革惨祸，可是严凤英的遭遇，还是让我听得喘不来气。那是一九八八年岁尾，我带《五四》剧组南下，首站直奔安徽，目标是两个安庆人：刚刚找到墓地的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蒙冤二十年的“七仙女”严凤英。十二月十八日记载：“中午一时抵合肥，住炮兵学院。晚上与导演去找王冠亚（严凤英丈夫），未遇。”十九日记载：“下午再去王冠亚家谈严凤英事件。极惨。严吃安眠药自杀后，被剖腹。”我从当年的采访记录里，也找到了王冠亚的口述，有两页，第一句便是：“严凤英六八年去世，已二十年了。”

王冠亚的大致陈述是：为追究六四年“天津黑会”反江青，六八年四月五日《红安徽》报点了严凤英的名，省艺校造反派就来逼供，她一天没吃饭，态度很硬，说柏龙驹、王少舫也去了嘛，却在这时王少舫贴出一张大字报，对严上纲上线，她非常伤心，说最好的朋友怎么讲这样的胡话。四月七日她在家写了一夜，反驳王少舫，又曾去找柏龙驹为她作证，遭到婉拒，她气极。当夜，王冠亚被严凤英哭醒，发现她已服了大量安眠药、留了绝命书。以下直接引述采访记录：

“我把医生找来，又去找军代表，但他来了以后还想搞口供，严还是讲自己不会反党，边讲边哭，他们还不让医生进来。我去借板车，送到医院，第二天（四月八日）早上五点钟死了。军代表马上要牛鬼蛇神表态，谁也不能流眼泪，说严凤英自绝于人民，后来为了转移视线，说严肚子里有发报机，要开肠破肚，我几乎要疯了，要我签字，我不干，我走后，听说当众将严开膛，用开刀的斧头大开膛，从胸骨一直劈到耻骨，把肠子翻出来，找出一百多粒安眠药，又拿去化验。军代表在现场。”

我至今还记得王冠亚的样子，瘦弱、清瘦，一脸不甘吞忍的哀怒。虽然一九七八年严凤英已被平反、一九八五年他也撰写出版了传记文学《严凤英》，一九八六年还在安庆树起了一座严凤英汉白玉雕像。这一切，算是还了严凤英一个公道了吗？只有王冠亚知道，九泉之下的严凤英，要的是一个公正。

别说八十年代末期，直到今天，文革仍然是禁区。中共不准人民再深究一步，于是，邓小平审判并监禁“四人帮”，也在全国逮捕各地的造反派头头，这么一场清算，就变成是他们自己报了私仇。这里缺的也是一个公正。

#### ◇ 杀戮现场指挥：军代表刘万泉

又二十年过去了，王冠亚还是没有放弃。最近我在网上竟又找到他的一篇文章，恰好拿来跟当年我的采访记录对照，关于“开膛破肚”的事实，这篇文字叙述得很详细，列录如下：

“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

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医生也不同意开，他们只会按医疗的方法开，而这是公安部门刑侦的技术，他们没学过，不会开。而领导讲，现在不是治疗的问题！

“他们开刀时，红梅剧团派了四个人在严凤英身边监视，‘屁派’一个男造反派头头，‘积派’一个女造反派头头各站两边，上方站的是‘革命干部’，下方站的是那个军代表刘万泉。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他们听到检举的所谓‘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可见得他的‘阶级仇恨’是多么深！”

当年王冠亚并未对我提起那个军代表的姓名，在这篇文章里，这个名字出现了：刘万泉，一个军队俱乐部主任。

王冠亚写道：“我倒不是为江青开脱罪责，一般讲，严凤英之死是江青的文化专制主义所害。但是，江青委实没到合肥来！更没有介入安徽省红梅戏剧团的文化大革命，直接责任是谁呢？那些斗过严凤英，诬陷过严凤英，尤其是整过严凤英的人，没有一个敢承担责任，那个刘万泉还被评为‘活学活用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保护起来了！党为他承担了责任，他却丝毫责任也不承担。后来，我们一位杨同志去问他，为什么把严凤英往死里整？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要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火，在安徽在剧团不整严凤英，整老鬼呀！他理直气壮推得一乾二净，一点责任也不承担。”

王冠亚这段话，真叫我对他刮目相看！

#### ◇ 中国人是毛氏大屠杀的同谋

至此，严凤英惨案已触及文革被隐讳的多个侧面。对中共来说，投鼠忌器，否定文革但不能“砍旗”，最大的元凶毛泽东必须赦免。公审林彪“四人帮”，也许是一个很不错的策略，往上可以遮拦住毛泽东，往下则可赦免这场血腥民粹运动的绝大部分暴民，掐头去尾取中段，像极了一勺红烧鲤鱼，结果是赢来政权、又得民心，从此江山底定。否则，追究“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者之罪，如何摘得出来那个号召者呢？依照政治学的常识，特别是韦伯的学说来分析，文革这样的“全民疯狂”，乃是“奇里斯玛”（Charisma）型领袖与拥戴民众的一场“共谋”，颇有法国大革命的诸多特征，甚至也很接近纳粹德国全民追随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那种“同谋”性质，这正是中国人难以彻底反省文革的原因。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至今默认中共袒护毛泽东，是在媾合一次新的同谋。亿万文革参与者内心的不乾淨，乃是这次同谋的心理基础。而邓小平及其继承者，其实谁也没有赦免，他们只是赦免了罪恶；他们也没有为这个民族找回丝毫公正，仅只如王友琴所言“遗弃了受害者”。

严凤英死于构陷、出卖、绝望。文革这场“古罗马斗兽场”式的全民大P杀，演绎的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是人性的所有丑恶、所有人的人性龌龊。王少舫演出“董永出卖七仙女”的一幕，是把严凤英推下悬崖的最后一击，《天仙配》这个神话，就被现实永远玷污了，于是，在严凤英身后的世界里，你越是赞扬黄梅戏这两位老搭档舞台合作的天衣无缝，便越是衬托了人间背叛的不道德和沉沦深度，而那些严凤英传记性的广播剧（特等奖）、电视剧（飞天奖），还有“严凤英、王少舫舞台艺术研讨会”等等，皆不免流于苍白和刻意躲避残酷真相的虚伪，即使有王冠亚的亲自参与，也无补于事。

#### ◇ 军代表执政将无法无天最大化

施暴者这个角色，在严案中举足轻重，他施行了一场可怕的私刑。文革的整个前提也许无法改变，人人自危、互相践踏的大环境也在所难免，甚至受害者也只能承受出卖、构陷等不义之举，但是，假如一九八六年春派驻安徽省黄梅剧团的军代表是另一个人的话，严凤英死后被“开膛破肚”的几率，几乎可以降低百分之九十九。这个骇人听闻的暴行，基本上是一个“拉大旗作虎皮”的私人性的为所欲为，一种泄欲、意淫的兽性的病态发作。我们痛定思痛，怎可不去厘清一下这种屠宰场和屠夫出现的机制呢？不错，毛泽东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乃是这机制的龙头，但文革之前老毛的头上已经没有一根头发了（无法无天），文革几乎就像他摇身一变成了孙猴子，拔根汗毛“噗”地一吹，变出无数的小孙猴子来——文革将毛泽东的“无法无天”最大化了，全国各个角落里雨后春笋般地生出无数个“小毛泽东”来，每一个都在他（她）的封地里称王称霸、草菅人命。这个“最大化”的机制，却是无人认真研究过的。如果简单一点点的描述，就如同全国最高法院将死刑核准权，一次性地批发给各省各地、各行各业、各门各派的各层级的无数头头脑脑，那么，中国不就成了一个大屠宰场了嘛！文革中握有生杀大权的人，有哪几类？我们只需问，取代瘫痪的党政系统功能的是谁，便一目了然。有两类是无需质疑的，一是群众派别的头头们，他们甚至可以发动地区性的内战；另一类便是各地军区、野战军派出的军代表们。

所谓“三支两军”，至今仍是文革研究的一个盲区，几乎无人涉猎，恐怕连最简单的大事记和基本资料都还没有。这个可以称为

“军代表执政”的时期，虽然不过是“全国军管”的别称而已，但它跟世界上的许多“军政府”不一样，尤其以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并无失权之虞，无需林彪的“保驾护航”。林彪集团及其所控制的全军，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造神工具，其最大功能是无限强化毛泽东的“奇里斯玛”色彩，使“一句顶一万句”变成无可怀疑的信条，变成“精神原子弹”，此乃这场现代迷信的基石所在。因此“军代表”们的职能，很像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处心积虑于识别、折磨并消灭异端者；严凤英惨案又惊人地相似于那个时期的所谓“女巫迫害”：十六、十七世纪西欧曾坠入一个疯狂迫害异教徒、“魔术师”的时代，宗教裁判所的惩罚酷刑计有砍手、剁耳、烙刑、笞刑、浸泡、锁绑、监禁、罚款、放逐、卖为奴隶等，死刑大部分是绞刑，还有斩首、溺死、裂刑等，然后焚毁尸骸，对“巫师”特别是“女巫”则直接烧死在火刑柱上，意谓“防范巨毒”。严凤英已经死了四十年，至今并未唤醒中国人：我们尚未走出中世纪。

~~~~~

【往事追忆】

北航文革中的两件事

• 戴维堤 •

（编者注：本文摘自《逝者如斯》一书中有关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 中央武装北航红旗

1967年8月5日，我从山东老家赶回北航后，中央已经武装了北航红旗。

“7.20”事件后，陈再道的枪杆子可能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吓了一跳。毛泽东指示：要武装左派！周恩来奉命执行。其实，早在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汉就当着周恩来、谢富治、王力、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面说过：“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

把他们武装起来。”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人贪污了这个“最高指示”，没有向任何方面传达。而陈再道等人早已经领会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百万雄师”的武器大部分来自武汉军区。

鉴于“北航红旗”在中国文革中的特殊地位，中央决定，首先武装“北航红旗”。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北京卫戍区奉命把数千支枪发给了北航。（注：谢天谢地，幸亏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无权给北航发枪。）

1967年7月27日，北京卫戍区在北京航空学院主楼前举行了隆重的授枪仪式，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公安部长、副总理谢富治，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军界领导人出席了授枪仪式。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同志奉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指示，代表北京卫戍区把二千五百多支苏式冲锋枪、新式半自动步枪和20支“五四”式手枪授予了“北航革委会”。随后，北京卫戍区有关人员如数把武器运到了北航。

这事立即轰动了北京市和全国。据我所知，文革中由中央直接发枪的，全国仅北航一家。外地群众组织的枪，有些是部队偷着给的，有些是抢的。

关于子弹问题，历史的事实是，当时谢富治、杨成武等人说，“你们还没有经过正式训练，发了有危险，过几天派解放军来军训时再发。”

关于给北航发枪一事，据韩爱晶说，他很早就向总理请示过，目的主要是想民兵训练打靶用。当时红卫兵们崇尚毛泽东诗词的一句时髦话——“不爱红装爱武装”。另外韩本人文革前是北航射击队的队员，爱好射击，有了枪可以组织民兵打靶——既刺激又好玩，这也是北航所有头头和群众的想法。除此之外，决没有任何其它背景，甚至同派性和武斗也联系不上，更不可能像北航某些人后来说的“是为了反党乱军、威胁首都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至于周总理在武汉“7.20”事件后为什么亲自批准给北航发枪，其中的奥妙笔者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此大事当然是毛泽东、林彪和中央、中央军委同意批准的。

现在看来，给群众组织发枪，绝对是神经病，但当时我们却受宠若惊。

革委会常委决定，由我和革委会委员刘建华负责武器保管和组建“北航红旗武装部队”问题。于是，我们把保卫部进行了改组和扩大，从全院学生中挑选了三千多人组成了北航基干民兵队伍，对内称“红武连”，对外称“北航红旗武装部队”。我们制定和公布了有关制度和组织纪律，规定：北航红旗武装部队的宗旨和口号是“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注：当时有人提出加上“誓死保卫林副主席”和“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我和韩爱晶等人认为有“誓死保卫党中央”就行了。）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只执行党中央、北京卫戍区和北航革委会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北航任何个人（包括韩爱晶本人）无权调动武装部队到学校以外执行任务。我们还建立了武器库，派可靠的红旗战士昼夜值班看守。我对管武器的学生下了死命令，没有我的批准，任何人（包括常委）不准动用一枪一弹，否则“军法从事”。万没想到，我这个近乎玩笑的命令，由于我和有关人员严格执行，后来管了大用，可说救了我 and 北航红旗一命。

◇ 北航“八·二四”事件始末

1967年8月24日，北航发生了打死学生李明清、吴仙虎的严重事件。李明清是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儿子，吴仙虎是工农子弟。

文革以来，在对待工作组和其它大是大非问题上，北航的大部分高干子弟同工农子弟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反工作组的人们得到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并于8

月20日成立了以工农子弟和中下级干部子弟为主要成分的“北航红旗”。以保工作组的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土崩瓦解，高干子弟们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和不满情绪。他们百无聊赖，有的外出串联，实际是游山玩水，有的谈情说爱，但有的人开始秘密串联，搜集中央内部斗争的消息和情报，把活动转入了地下。随着父辈们受冲击越来越厉害，他们对文革开始怀疑和反感，由开始的“保工作组派”变成了“保爹保妈”派。他们对北航红旗和全国造反派——尤其是蒯大富等人十分仇恨，进而对中央文革直至毛泽东也产生了怨恨情绪。

从1966年8月初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邓小平和一些老干部开始挨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的被整，使得一些高干子弟感到“唇亡齿寒、如丧考妣”。北航的高干子弟们同社会上的老红卫兵和“联动”分子们一道，开始公开“炮打中央文革”，指名道姓地批评和指责江青等人，最后发展到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主席。“你毛泽东可以炮打刘少奇，我们为什么不能‘炮轰’一下你毛泽东？”1966年8月24日，北航6系（导弹系）学生李明清（李井泉之子）等5个高干子弟联名写出了一张《炮轰……》的大字报，在为刘少奇等老干部喊冤叫屈的同时，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大字报一出，立即轰动了全院。

当时我们刚翻身，北航红旗刚成立4天。作为红卫兵造反派，我们对李明清的大字报坚决反对，但又不得不从心理佩服李明清等人的胆量。事后，李明清等人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门关了一些日子，后又放回了学校。（注：事实上是毛泽东和江青让谢富治放的。）从此，李明清等高干子弟们当起了逍遥派，但对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始终耿耿于怀。

吴仙虎是北航九系学生，当时对他毫无所知。据说他也是老造反，但思想极左，目空一切，因此可能没有参加北航红旗，更不是头头。

多年之后，笔者才从沈如槐（清华大学414一把手）先生的书中得知吴仙虎的有关情况。原来他文革初期就“跑单帮”，在西南地区串联时曾经和沈如槐等人认识并一起成立了“清华北航南下串联小分队”，吴仙虎自任负责人。据沈如槐书中说，吴仙虎曾带领他们大闹西南局，抓住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不放，逼着李井泉对他儿子李明清的《炮轰……》大字报表态，企图逼迫李井泉承认自己是李明清大字报的后台。最后李井泉写了一份表态性的文字，其中说：

李明清是我的第二个儿子。他在北京航空学院写这张大字报我事先不知道。他也没有向家里任何人谈过。后来我看到了同学们抄来的这张大字报，我认为这张大字报是极其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立即托在北京的同志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并且赞成和支持同学们对这张大字报进行彻底地批判。

李井泉 1966年11月4日

关于这件事，在北航都少有人知。

吴仙虎回学校后，不知什么时候思想发生了180度大转变，开始反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1967年夏，他在北航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谈谈孙悟空》，“影射攻击”毛泽东、江青、中央文革和北航红旗。大字报一鸣惊人，吴仙虎出了名，立即受到了红旗战士们的批判和围攻。

1967年8月20日，北航红旗的学生刘天章在河南串联时，因介入开封化肥厂的两派武斗，被保守派开枪打死了。（注：不久，北航红旗战士周锡坤在湖南湘乡县城被保守派抓住后枪杀于县城街头，身上中弹数十发。）

刘天章是普通干部子弟，为人正直朴实，艰苦朴素，关心党和国家命运，思想比较激进，是北航红旗的骨干分子，在同学中威信很高。

刘天章同我很熟，本来，他是约我和他一块去河南串联的。我因工作忙，脱不开身，他便一个人去了开封，结果血染黄沙，命丧古城。

噩耗传来，北航立即炸了锅，北航红旗的战士们气炸了肺。

当时，北航红旗号称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在全国响当当、硬梆梆无人敢惹。我想打死刘天章的人也不一定知道他是北航红旗的。当时，中央刚武装了北航红旗，发了数千支枪。假如打死刘天章的人和单位在北京，那后果不堪设想。

北航革委会成立了数十人的治丧委员会，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认刘天章为革命烈士。追悼会上，主要头头们对天鸣枪为刘天章送行。

奇怪的是，做为刘天章的好友和保卫部长，我既不是治丧委员会成员，也没有上主席台。

追悼会后，刘天章的骨灰放到俱乐部门口灵堂，北航红旗战士们为刘天章守灵。一些炮打过中央文革的高干子女被押来跪灵请罪，红旗中的一些学生发誓要为刘天章报仇，许多对北航红旗不满的人吓得敢怒不敢言。如果说那几天北航充满了“红色恐怖”，也算事实。

8月24日，恰逢“炮轰……”大字报发表一周年。这天晚饭后，一些北航红旗的学生们自发地陆续把几个“炮打中央文革”和写过“炮轰……”大字报的学生拉到东操场批斗，其中有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子李明清，地质部长孙大光之女孙茜玲，建材部长赖际发之子赖锐锐，铁道部军管会主任苏静之子苏晓前和工农子弟吴仙虎等人。当时人很多，现场很乱，没有固定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批斗过程中，发生了武斗，有些在北航串联的外地学生也参与了打人。后来人群一轰而散，被批斗者都自己回了宿舍，当时并没有死人。惟有吴仙虎被一批学生拉到十二楼前继续审问拷打。

历史的事实是，这天晚上，恰逢北航革委会在主楼召开全体会议，所有头头们不知道东操场发生的事情。散会后，已经很晚了，头头们往宿舍走。韩爱晶等主要头头们听说十二楼前批斗反革命，绕道走开了。我住十三楼，和几个革委会委员路过十二楼时，见许多学生们正在打吴仙虎。我当时并不知道批斗会的全过程情况，吴仙虎本人我也不认识。我从来反对动手打人，文革中我从未打过一个人，包括小偷流氓。于是我对打人的学生（大部分是“红旗”的老造反们）喊道：“算了，算了，别打了，快回去睡觉吧！”一些学生把我推开，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管不了，快回去吧！”于是我便和几个头头回宿舍睡觉去了。对这件事，我虽然简单地制止了一下（我是唯一出面制止的头头），但没有最后尽到责任，这是我的严重失误，多年来我一直十分内疚。

我当时之所以没有站出来坚决制止，一是打人的学生都是老造反，有些还是基层的头头，听不进劝。他们正在火头上，我一个革委会委员是管不了他们的；二是我个人认为群众专政嘛！反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批斗时打几下也可以。我当时确实有这种思想，但我当时绝对没有说过这种意思的任何话，也根本想不到后来会打死人。天快亮时，有人叫我来，说吴仙虎被送到了保卫部。我去一看，吴仙虎被打得很重，打人者全跑光了。我立即让人把吴送了校医院，吴因伤势太重，死了。

我正破口大骂打人的学生们时，又有人来报告，说李明清也死了。我和革委会委员李某某

跑到李明清宿舍，见李明清躺在床上，我摸了摸他的胸口，心脏已停止了跳动。同宿舍的学生说，李明清回来后，喝了许多凉水就睡了，天亮时发现他已死去。李有心脏病，可能是被打后导致了心肌梗塞所致。李明清之死，吓了我一跳，北航谁都知道他是李井泉的儿子，这下子问题就麻烦了。

我立即报告了常委们。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被批斗和挨打的几个高干子女，文革之初我和他们一块造反，彼此有些了解，后来因观点分歧，分了手，但我对他们并无成见，我理解他们老子被打倒的心情，所以当他们炮打中央文革被公安部抓去关了一段又放回学校后，我并没有难为过他们。这点，孙茜玲、赖锐锐等人后来替我说过公道话。他们说北航头头中戴维堤是个好人，要不是他，我们可能都被打死或整死了。孙茜玲、赖锐锐等人后来都成了高级干部，他们当时确实是死里逃生。

学校出了人命，主要头头们皆很吃惊，韩爱晶说：“这件事同革委会没有关系，谁干的谁负责！我们没有让他们开批斗会，更没有让他们打人，谁打死人谁负责！”韩让我把此事上报了市公安局和卫戍区。

处理完后事后，北京卫戍区奉江青指示，限令北航24小时内交出凶手。

文革中被害死、打死的人成千上万，无人问津，屈死的冤魂不知有多少。江青之所以对北航大发脾气，主要还是李明清是李井泉的儿子。中央文革整了大批老干部，包括李井泉，已经不得人心，如今中央文革的“铁拳头”打死了李井泉的儿子，当然是给中央文革找了麻烦，让“老家伙”们抓住了把柄，所以江青十分恼火，下令抓凶手。韩爱晶立即召开革委会，研究抓凶手的事。

实事求是地说，韩爱晶在抓凶手问题上，是持坚决态度的，其目的可能和江青一样，为了洗却自己和北航革委会的责任。所谓韩爱晶抵制抓凶手的说法是不对的，但一谈到谁是凶手问题上，革委会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

经对目击者和参与者调查，一时很难判断谁是主要凶手。批斗会确实是群众自发的，导火线是红旗战士刘天章在河南被保守派打死了，许多红旗战士有报仇心理。批斗会没有固定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参与打人的学生也有上百人，有些外地学生打得也很厉害，很难说是谁打死的。革委会头头们谁也不敢判定谁是主要凶手并送卫戍区，但卫戍区限令半夜十二点交人，怎么办？

韩爱晶等人主张，把参与打人者全部送卫戍区，让卫戍区和公安局去处理，该怎么办怎么办！

但这样大约要送一百多人，这不成了示威了吗？许多人反对韩爱晶的意见。

我建议，既然马上定不了凶手，可以先派代表去卫戍区解释一下，缓几天时间，等查出凶手，立即送去，若今晚不去人，过不了关。

众人同意我的意见，许多委员自愿当谈判代表。我是保卫部长，负责同卫戍区和公安局的日常联系，自然算一个。革委会委员匡正芳和徐佛书愿意去。为了解情况方便，吴仙虎的同班同学张平也被选中。

我们四人正要动身，突然革委会女常委杨瑞云说：“戴维堤最好不要当正式代表。这件事事关重大，需要性格脾气好的人去办，戴急性子，别把事情办砸了。”

众人同意杨的意见，我也无话可说。于是我不算正式代表，但负责送他们去卫戍区谈判。

我调了车赶到卫戍区时，正好半夜十二点。

卫戍区支左办公室主任哈斯和另一位干部接待了我。我郑重说明了北航革委会的决定，今天实在查不出凶手，但我们有诚意，为了尊重卫戍区，我们特派了三位革委会代表，同你们谈判，希望宽限几天时间。

哈斯笑着说：“可以，你让代表们留下，你回去吧！”
我说：“你们谈吧，我等着！”

一会儿卫戍区来了辆小轿车，让代表们上车，匡正芳、徐佛书和张平随哈斯上了车，立即开走了。

我突然恍然大悟，不好，上当了，哈斯把我给涮了。我急得在卫戍区门口大喊：“姓哈的，我们来的是谈判代表，不是凶手，你要听清楚了！”

我立即乘车返回了北航，向韩爱晶等人报告了情况。韩爱晶一听，笑着说：“你们走后，我们就议论，你干不成大事，非捅漏子不可。我们早就想到，去的人一时回不来，所以未让你去。算了，这事我来处理吧！”

我不领情。人是我送去的，许多人都会骂我，我的面子往哪儿放？我要返回卫戍区要人，若不行，我也不回来了，陪着他们坐牢。韩让我别蛮干。

第二天，我又去卫戍区找哈斯，同他大吵了一顿。哈斯一点也不发火，他笑着说：“我也是奉命行事。你们也替我想想，江青同志和司令部首长们命令我抓凶手，不这样你们什么时候交出凶手？你快回去抓出真正的凶手送来，我们就放人。”

结果，匡正芳、徐佛书、张平三人被关进了功德林看守所（这里曾关过溥仪），受到了极不友好的待遇，徐佛书因解释被打得鼻青脸肿。7天之后，韩爱晶请谢富治写了一张条子“若果真不是凶手，可以放人。”我拿着条子去要人，卫戍区只放了匡正芳、徐佛书。张平因在监狱里承认打过吴仙虎一个嘴巴，被当作凶手和人质仍关着不放。

张平的老父亲从东北老家跑到北航来要儿子，天天坐在我的办公室门口又哭又闹，搞得我没法工作，后来还是找谢富治写了条子才放了出来。张平被关了7个月零7天。

那位北京卫戍区支左办公室主任哈斯，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听说他后来也犯了错误，被关了起来，不知真情如何。

后来，工、军宣队进北航后继续抓凶手，查了半天，也定不了谁是主要凶手。最后，把发起批斗和参与打人较厉害的几个学生抓起来判了几年刑。

以上就是北航“八·二四”事件的全过程。

李明清、吴仙虎二位同学是好同志，他们不该死。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

反对毛泽东的错误路线，为此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愿他们的冤魂安息。

~~~~~

## 【难忘岁月】

### 夺权未得到中央承认

• 梁守福 •

（编者注：本文摘自《乱流浮沉半生缘》一书中第六章：“浪尖上的划板”，标题为编者所加。）

#### ◇ 组织赴京汇报团

由于夺权比较仓促，事先没有请示中央，所以中央对安徽的夺权没有象对黑龙江、山东、贵州、山西等省承认的那样快。在反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总指挥部不能坐等，也不能消极地等待《解放军报》社的记者刘慎思向中央报告情况。必须由总指挥部组织代表团，向中央直接汇报夺权，经与省军区商量，代表团先由四人组成：省军区的彭胜标、总指挥部的王中、曹再风、李胜利。他们四人也是分两批走的，王中和李胜利先去。因为总指挥部的保密电话已不能和中央办公厅直通，必须派人联络。王中在历史上曾与康生夫人曹轶欧共过事，与康生也比较熟。想通过这层关系与中央直接发生关系，并希望中央早日安排接见，承认安徽的夺权。王中和李胜利大约是二月二十四日左右去北京的。王中很快见到康生，并向他简单汇报了情况，康告诉王中，“由于事先没有通知中央，你们既然来了，等我们安排一下”。紧接着彭胜标也分别到了北京。

三月四日，康生正式接见彭胜标、王中、李胜利和曹再风。康生在听取汇报后，表明他对安徽的问题过去没有直接过问，听说安徽的情况还是不错的。要他们通知家里（总指挥部）尽快搞个“三结合”的方案，再多来几个同志，最好严光同志也来一下，一起谈谈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人事安排问题，并表示安徽夺权问题不大。以上内容是李胜利从北京打电话直接告诉我们的。

三月六日左右，严光代表总指挥部率任质斌、胡向农（原省人委办公厅主任）、张泰升和省直机关几个一般干部，又加派了群众代表李文安、刘光裕、蒋云章共十余人前往北京。

三月八日，康生、王力、关锋接见了严光、彭胜标、康生等人再一次表示，中央很快批准安徽的夺权。但谈到革命委员会人事安排时，严光却提到李葆华如果不是刘邓线上的人，是否可以考虑结合？这个问题引起康生等人的警觉，但康生等人依然认为安徽问题不大。

三月十一日，周总理办公室的余庭杰前往代表团，通知严光等人要家里做好庆祝成立革委会的准备。《红旗》杂志社也派人约稿，并协商祝贺的文章；《人民日报》社也派了人。这时安徽的各夺权组织，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军队也准备庆祝游行；大、中、小学的“八·二七”开始排练庆祝活动的各种队形和字形。我也高兴地向总指挥部的学生工作人员说：“革委会成立后，我可以卸担子了，好好休息几天，然后我带你们到黄山去串联，补补串联课，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种欢乐来自群众的内心，说明几个月的浴血奋战换来了胜利之树，但它只是精神胜利的象征。因为胜利之树结出的胜利之果，在给中央“三结合”的报告中，又交给了军队和革命领导干部了。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军以上干部会上宣布：我们再承认两个省市的夺权，一个是安

安徽省，一个是北京市。因为严光、彭胜标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回来高兴地告诉李胜利，要李胜利赶快通知家里，加快各种庆祝活动的准备工作。

三月十四日上午，在总指挥部南楼会议室，召开宣传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我做了总结性地发言，发言的要点是：

（1）无产阶级革命派开展的夺权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2）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是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的继续，最终的目标都是要夺取权力。

（3）从夺权斗争中，看到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李葆华的失败和“八二七”等革命造反组织的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

（4）夺权斗争的世界意义，就是告诉全世界的革命者，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5）夺权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伟大的实践，是反修防修的大练兵、大演习。

（6）无产阶级只能用夺取的政权——主要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把政权巩固起来。（材料来源于我的发言提纲）

宣传的重心是突出历史唯物主义，把夺权斗争与“反修防修”联系起来。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无情，他对以李葆华为首的旧省委适用，对新生的总指挥部也同样适用。俗话说，“乐极生悲”，正当夺权的造反派兴高采烈地准备庆祝活动，一个改变中央主意的突发事件突然发生了。这就是“三·一五。”事件。

#### ◇ 处理“三·一五”事件

三月十四日中午，反夺权组织“新一司”的造反派头头邵丙炎找到我，他们准备十五日上午在市体育场召开“声讨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大会。因为三月份陶铸在中央已经失势，而遭到全国性地声讨和批判，开这样的大会，我当然没有理由拒绝他们。当时就答应下来，并问他们邀请不邀请“八·二七”的代表发言，邵说：“没安排”。当总指挥部的其他成员知道这件事后，都有不同看法，特别是侯建新，他认为我们同意他们开会，就等于给他们搭台子让他们骂我们。他们批判陶铸是假，反夺权是真。我说：“那怎么办？我已经答应过了收也收不回来，他们要骂给他们骂去，如人家骂几句，就把我们骂垮了，说明我们是纸老虎。”侯坚持不同意。于是，下午三点钟左右，总指挥部在肥的常委召开一个紧急会议，讨论怎样阻止反夺权派十五日会议问题。通过讨论，大家认为只好以总指挥部的名义发个紧急通知。通知的大致内容是以“抓革命，促生产”为名发通告，要求各群众组织不得停产开大会，没有总指挥部的同意，不得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等内容。通告拟好了，如何让全市都知道，又成了问题。结果，我提出是不是请合肥警备区出面，用宣传车直接在主要干道上广播，大家觉得也只好如此。总指挥部的通知，也是我根据大家发言归纳整理的，最后，由警备区的副政委史某某站在广播车上直接广播的。

事情办完后，我怎么也睡不着觉，总觉得会出问题，怕在会场上出现骚乱，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十五日凌晨四点，我要调查组派几个人去合肥体育场察看会场布置了没有，如果会场布置了，说明他们真的开会，要通知工学院的学生不准捣乱会场。因为工学院就在市体育场隔壁；如没有布置，说明他们不打算开会，可能会召集一部分人在大街上游行抗议总指挥部的通知。

大约五点钟，调查组的人回来报告：没有布置会场，体育场连一个人也没有。这时，我知

道上当了，赶紧通知侯建新，说明情况。并决定早晨六点钟，在省军区召开“八·二七”纵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要求各高校的“八·二七”不准结队上街；不准与反夺权的队伍发生冲突。六点半左右，参加会议的人基本到齐，我把上述要求作为总指挥部的命令发出，并要求会后，各高校立即用广播站发出通知。八点钟之前，各高校务必做好工作。尽管如此，上午九时许，安徽医学院和工大的部分“八·二七”还是在四牌楼与反夺权的游行队伍发生冲突，烧了另一派的旗帜，还使几个人受了轻伤。

当天下午，《红旗》杂志社的记者童金朗拿着现场拍摄的照片找到我，这时《解放军报》的记者刘慎思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了，也不知童金朗是何时来的，他代替了刘慎思的工作。

“三·一五”事件成了中央否定“一·二六夺权”的导火索，事实上，中央在“三·一五”事件之前，就单独接见了程明远等反夺权的代表。在“三·一五”事件前，全国不少地方发生了“支左”解放军压制，甚至镇压造反派，青海省就出了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下令要军队向造反派开枪，造成了伤亡。武汉出现了压制、取缔造反派组织。这让中央文革小组对安徽夺权产生疑虑，对省军区的“支左”态度产生不信任。这从康生以后的讲话中可以得到证实。1967年10月20日，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李天佑等接见安徽赴京代表团时说：“‘一·二六’省军区支持是假的，现在他们承认，实际上是保李葆华。你们看，一月二十三日他们还在保李葆华，一月二十六日，怎能支持你们呢？所以中央考虑到这个问题，实行军管，没有批准‘一·二六’夺权。”其实，在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中，也有明显的暗示，不让严光担任军管会主任，《九条》决定中，还指出：“严防坏人利用军管镇压群众”。其实，“二月逆流”才是真正的潜台词。

三月十六日，康生、王力、关锋等人接见的不仅是总指挥部的代表，而是紧急通知一部分反夺权的代表，其中包括程明远等人。在会上，康生等人对“三·一五”事件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并不准总指挥部的代表发言，康生还骂史某某是跳梁小丑，康生拍桌子骂李文安欺骗中央等等。

三月十七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安徽问题的五点建议》发到全国。（全文见附件）

中央文革小组的五点建议下达后，我立即向中央表态对“三·一五”事件承担责任，并表示坚决拥护、贯彻执行五点建议。又就夺权后出现的问题作了初步检查；再通过记者访谈形式表明愿意同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商量大联合问题。但为时已晚，反夺权组织不愿谈，并且事端更多。

三月十九日，周恩来总理、康生、王力、关锋又接见了双方代表。不知为什么以后的所有接见，总理都来参加，会场上双方代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反夺权一方抓住总指挥部不批斗李葆华，也不许别人批斗李葆华并百般保护李葆华这个问题不放，认为“一·二六”是假夺权，是李葆华和平让权，“八·二七”和李葆华有君子协定等等。在李葆华的问题上，总指挥部某些做法确实被对方抓住了。例如：把李葆华放在省委印刷厂保护起来，每周还有解放军陪他到江淮西小楼去洗澡。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严光三月二十一日，又去找徐海东大将和时任代总长的杨成武活动，希望他们能出面为安徽说几句话。由于二月大闹怀仁堂的事件，许多老师、老将军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当然找了也于事无补。也正是严光的这些活动，更增加了中央的不信任，把省军区支持“一·二六”夺权与老师们大闹怀仁堂联系在一起，这更增加了中央文革小组否定“一·二六”夺权的决心。

## ◇ 周恩来的两次接见

风云突变，严光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希望我到北京去一趟，在总理面前做个检讨，看能否挽回败局。

我三月二十四日到达北京。因为前几次接见的情况，我在电话里都知道了，他们不要再谈。关键我不是代表团成员，又不是中央直接通知我去北京的，我能否参加接见还是个问题。后来还是李胜利想了办法，在接见时给总理写条子说总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梁守福同志到了，就等在外边，看总理怎么处理。三月二十五日凌晨，代表团成员乘大客车到人民大会堂北门，我只好坐在车里等消息。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李胜利出来了，告诉我，总理同意你进去。

进大会堂后，我也不知东西南北，反正跟着李胜利后面走。到了接见厅，又不知道自己该坐在那里，因为我是列席成员，于是，我在最后一排坐下来。这时周总理打手势要我往前坐，到了中间我又想坐下来，屁股还没有着凳子，总理又打手势，让我还要往前坐，指着凳子，要我坐在最前排与他面对面。

我刚坐好，总理讲话了：“梁守福同志你来迟啦，本来我们也要请你来一下的，现在我想听一听你的意见。”

我正要准备发言时，有人拿一个话筒给我，我也不知道是录音用还是扩音用，我对着话筒发言。我说：“这次到北京来，主要是向中央检讨的。首先，我们在夺权前，没有请示中央，跟着大潮流就把省委的权夺了，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夺权后，也没有立即派人向中央汇报，这就更不应该了。我作为一个受党多年教育的党员，我愿意接受党给我的任何处分。”这时总理插话：“有这个态度就很好嘛。”接着我又说：“第二，夺权后，没有按照中央的精神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并对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同志采取压制的态度。如果中央承认我们的夺权，我们一定搞好大联合，决不压制不同意见”。我的话刚说到这里，反对夺权的丁某某，站起来大声指责说：“梁守福！你不要再欺骗总理了，就在你来北京的那一天，总指挥部还组织了三万农民上街游行，口号是，‘踏平红革会！打倒刘秀山’”。这时，我并没有大声指责她是造谣，我只是对总理说：“我不知道此事，我来北京那天，肯定没有农民上街游行”。当时不知道总理是怎么想的，居然相信了丁某的话，微笑地对我说：“梁守福同志啊，你们现在还压人家嘛。你再接着讲。”我接着检讨。第三。在干部的解放与结合上，我们犯了先左后右的错误，开始时对领导干部一概不信任。党中央提出“三结合”的方针后，我们急于要中央承认，结果又犯了右的错误，不管干部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否经过批判已经改正，统统准备结合。我很对不起那些较早站出来支持我们，后来又受到压制打击的革命领导干部。”这时程明远慢条斯理地插话了：“梁守福，你这个小家伙就是不够意思，你们受压时，我们冒着杀头危险支持你们，开始你还是不错的，为我的安全，把我送到工学院保护起来，你还去看过我。可是你们翻身以后呢？翻脸不认人，到处通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在北京时，李葆华用小汽车接，用小汽车送，和他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李葆华还给了你三万块钱，我看是李葆华把你收买了，搞修掉了。”程明远发言时，总理在看文件。程明远讲完话，周总理取下眼镜看着我微笑，我也报以微笑，没有反驳程明远的发言。我从总理微笑的神态中，可以感觉到总理根本不相信程的讲话，因为这个讲话在当时太离奇了。这时周总理也许太累了，用热毛巾擦擦脸，接着说：“梁守福同志，你继续发言。”我说：“第四点，我向中央表个态，不管中央最终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坚决服从，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向北京的蒯大富学习，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这时，总理高兴地插话说：“梁守福同志这个态度就很好，值得大家学习，知错改了就好嘛。都应该多做自我批评。”周总理一直很注意我的发言，我讲话时，总理从不边看文件边听讲话。

周总理说完话，又戴上眼镜看材料、文件什么的。这时康生主持发言。我记得李文安一面

检查，一面申辩时，康生很生气地拍着桌子说：“你不要再骗我们了，我们不许你发言，不接受你的检查。”这时李文安也毫不退缩地说：“康老，你别生气，听我把话讲完。”这时关锋也大声地说：“我们不想听你们的假话”。会场上的气氛很紧张，其他人也作了发言，但任质斌不敢说话，因在前次的接见中，关锋算任在山东的老账，任吓得不敢再说话。大约凌晨四点左右，周总理宣布散会。

回到代表团的驻地后，总结接见情况时，严光批评我：“丁某发言造谣时，你怎么不敢说她是造谣？”我说：“二十四日以后的情况我不知道，怎么就能当着中央首长的面就肯定她是造谣呢？”严光说：“二十四日的情况你不知道，你应该叫中央当时就打电话核实嘛！”我说：“当时没想到，中央领导难道也会听信造谣吗？”

严光说：“怎么会？总理不就表态了吗？”代表团总结了两次接见，特别是三月十九日的接见让周总理参加，恐怕与周总理三月十三日的讲话有关。中央不再承认安徽的夺权，与其让中央主动地否定，不如我们主动提出军管，权力不能落在程明远他们这些人手里。最后，让李文安代表代表团上交提出军管的报告。

三月二十七日夜，周恩来总理又将不同观点的两派代表请到人民大会堂某省厅。总理说：“全都到齐了吧？现在开会。经过几次会议，各种观点都摆出来了，也和安徽省军区的同志谈过。现在把党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宣布一下，请康生同志宣布，并解释一下。”

《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共九条。所以通常人们都简称《九条》决定。（《九条》及康生讲话见附件二）

由于康生解释九条的讲话比较多，不能全部抄录，我只将九条中的第一条抄录下来：

根据两个月实践检验，安徽“一·二六”夺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没有把矛头指向省委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个别领导人实行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中央认为，应立即成立以钱钧同志为首的军属管制委员会，把省里的领导权掌握起来。

这次接见再也没有发生辩论，更无争吵，康生也没有拍着桌子训人。似乎：“G”、“P”两派的代表都感到了某种心理上的满足，夺权者没有像王力说的那样是假夺权；反夺权者认为自己否定了夺权，但自己没有拿到权，不彻底，还得继续革命到底。

会议结束前，周总理说：“同志们马上就要回去了，临走前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大家，我向每个代表赠一枚毛主席像章。”周总理的讲话刚一落音，代表们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就是毛主席的像章结束了安徽的“一·二六”夺权，同时也结束了毛泽东主席亲手点燃的“一月风暴”。自从解决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发至全国后，再也没有承认过一个省的群众性夺权，从此后，“一月风暴”的风雨声完全淹没在“大揪军内一小撮”的炮轰声中。造反派又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受军区支持的夺权派成了支军派，“大揪军内一小撮”的成了炮轰派，这是造反派由对待“支左”解放军的态度引发了第三次分化与重组。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了动枪动炮的“武化大革命”，这才是文革中的真正天下大乱。

如果说，安徽文化大革命的“乱流击水”、“惊涛裂岸”的老篇章把我送到风口浪尖上，而“一·二六”夺权则让我踩在浪尖的划板上，不管我怎样想保持平衡，但最终还是从划板上跌入水中，又要在新一次的浪潮里搏击游泳。

中共中央的九条决定，结束了“一月风暴”中群众夺权的篇章，翻过了群众掌权的一页，也结束了我生命中的华彩乐章。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拿起了安徽的权杖。在省军管会的领导下，能否让权力升华？只有用历史的事实来回答。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